

獨到的視角，宏大的構想

● 張林祥

中央集權的專制帝國何以能在中國以王朝循環的形式持續兩千餘年，這是中國歷史最大、最富挑戰性的問題，圍繞它已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理論。李開元的《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也是為解決這個問題所做的初步嘗試。作者認為：「劉邦集團之結構和性質，規定了漢帝國之結構和性質之起點」。



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0）。

中央集權的專制帝國何以能在中國以王朝循環的形式持續兩千餘年，這是中國歷史最大、最富挑戰性的問題，圍繞它已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理論。李開元的《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也是為解決這個問題所做的初步嘗試。作者此前曾自創了包含基層、中層、高層的史學層次理論模式，

並據以批評已有的「高層理論」都是「總體性的假設，其意義局限於通史之一般性解釋」，「其立論的根據非常間接……無法還原到較低層次的史學研究中求得實證」。三個層次的史學不但不平衡，而且事實上是脫節的。因此作者認為，「以總體假設的方式直接建立中華帝國的理論方法也許不是最佳方法」（頁6）。有鑒於此，作者試圖探討一種可以將三個層次的史學貫通的方法，使較高層次的史學獲得較低層次史學的支持。他的思路是：典型王朝—典型模式—整體模式，即退到起點，從中華帝國的起源入手。眾所周知，統一的中華帝國起源於秦，但秦祚短促，史料缺乏，而漢承秦制，並進一步發展成熟，所以作者選擇漢朝入手是順理成章的。

作者的一個基本認識是：「劉邦集團之發生發展、成長壯大、統一天下的過程，就是西漢王朝建立的過程」；「劉邦集團之結構和性質，規定了漢帝國之結構和性質之起點」（頁9）。而「高帝五年詔」的發布和實施，使劉邦集團軍吏卒及其家屬成為「一個擁有強大的政治勢力和經濟基礎，具有高等社會身份的新的社會集團」，作者稱之為「軍功受益階層」（頁54）。「軍功受益階層」

是全書的核心概念，也是作者最後解決「中華帝國問題」的典型模式。這個概念的基本依據是「高帝五年詔」及其實施。此外，作者還賦予「懷王之約」、「封爵之誓」、「白馬之盟」以特別重要的意義：「懷王之約，已經成為劉邦集團建立獨立的漢王國的法統依據。封爵之誓和白馬之盟，則直接關係於漢代王侯功臣之分封，特別是白馬之盟，其於漢初之政治，更有全面性的影響。」（頁180）在這個認識基礎上，作者對西漢初年的政治結構、政權性質以及重大政治事件作出了富有啟發性的解釋。

「漢初之政治結構可以理解為宮廷皇權、諸侯王國和以丞相為中心的政府的三權並立的政治結構」（頁227），而宮廷皇權實際上直到惠帝死後呂后當政時才真正形成，漢初的政權基本由丞相為首的中央政府所控制，皇權是有限的。這就是說，劉邦基本上沒有行使皇權，其中緣由除了上述政權結構之外，恐與劉邦在位時間短促而又主要致力於帶兵征戰有關；而惠帝的懦弱無為，除去性格上的仁慈謙讓外，更主要的原因當然還是軍功階層和呂后的雙重箝制。呂后的稱制專權特別大封諸呂的行為，公然違背白馬之盟，是對軍功階層的第一次挑戰，破壞了三權的平衡。由於呂后的行為也直接威脅到劉姓諸侯王的利益，所以本來是皇室外援的諸侯與軍功階層聯手挫敗了呂后的政變，使三權重歸平衡。此後，文帝、景帝實際上繼承並更加有力地實踐了呂后的政策，即：加強皇權，抑制軍功階層，削弱諸侯王。

其間發生的許多大事都可以在這個背景下得到解釋，如文帝的列侯之國與侯國遷移政策、賈誼的左遷、周勃的冤獄、景帝削藩及晁錯的慘死、周亞夫的冤死等等，都是三權間的相互鬥爭或這種鬥爭的反映。鬥爭的結果是，軍功階層走向衰落，由下而上漸次退出政治舞台，被日益壯大但依附於皇權的法吏、軍吏、儒吏等階層所取代；諸侯國削弱以至郡縣化，而宮廷日益強大，最後形成專制皇權。這一重大變化的標誌，便是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的周亞夫之死和衛綰的出任丞相。由此可知，從漢王朝建立到重新形成秦王朝那樣的專制帝國，中間還有一個六七十年的過渡期，顯然不能用一句「漢承秦制」搪塞過去。像作者這樣條分縷析、追根究柢的功夫當然比援用現成概念大而化之的概括更能接近歷史真實。

發生在西漢初年的這種權力鬥爭實際上具有很強的典型意義，蘊含着某種規律性，差不多在歷代王朝建立初期以不同的形式上演過。鬥爭的結局都是相權削弱，皇權加強。不僅每朝如此演變，而且二千年專制帝國的政治制度也是如此演變。這一點已為章太炎、李俊以及日本和田清等許多學者所見及。西漢的獨特處在於諸侯王國的存在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變量，因而這種鬥爭更加錯綜複雜，富於戲劇性。作者用三權並立的格局來解釋它，應該說比較成功。有些觀點雖非作者首創，但一經他的模式解釋，顯得更加清晰和精確。受這一成功的鼓舞，作者決定把軍功受益階層這

發生在西漢初年的權力鬥爭，蘊含着某種規律性，差不多在歷代王朝建立初期以不同的形式上演過。鬥爭的結局都是相權削弱，皇權加強。不僅每朝如此演變，而且二千年專制帝國的政治制度也是如此演變。這一點已為章太炎、李俊以及日本和田清等許多學者所見及。

儘管作者一再聲稱軍功受益階層是一個強大的政治、經濟、社會階層，但是至少在本書中它基本上是作為單一的政治因素發揮作用的，在經濟、社會、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影響幾乎沒有涉及，因而其片面性很明顯。

個概念加以推廣，運用到歷代王朝中去，逐一接受檢驗，最終回答「中華帝國問題」。這無疑是個宏大的構想，令人激動；但也是一項有風險的探索，令人擔憂。首先，軍功受益階層這個概念主要建立於幾個詔令和盟誓之上，其實施及約束力包含一定的假設成分。雖然作者幾乎錙銖不遺地網羅了有關證據，並花費大量精力作了周密的考證和科學的整理，但是我們仍然看到，這些證據基本上局限於三公九卿，也就是劉邦集團的核心。其次，自秦以來，中國歷代王朝確實差不多都是由一個政治軍事集團通過戰爭的形式建立的，戰時形成的政治體制和權力核心往往延伸到和平年代並長期主導政局（這種情形實際上不限於帝制時代，軍功受益階層這個概念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亦不乏借鑒意義）。但各個王朝的具體情況畢竟存在很大差異，即使不考慮篡權、弑逆、禪讓等因素的存在，建立各王朝的軍事集團成分上的差異也是不容忽視的。更重要的是，不同的時代在經濟水平、社會生活、思想觀念等方面也存在巨大差異。第三，儘管作者一再聲稱軍功受益階層是一個強大的政治、經濟、社會階層，但是至少在本書中它基本上是作為單一的政治因素發揮作用的，在經濟、社會、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影響幾乎沒有涉及，因而其片面性很明顯。如果說任何一種模式都是對紛繁複雜的歷史的剪裁和簡化，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那麼我們在對此保持清醒認識的同時，當然希望多種模式並存和互補。

如果拿作者自創的「史學層次理論」來衡量這項研究成果，我們感到它在基層和中層相當成功，高層史學即對「中華帝國問題」的解決還須俟諸來日。平心說來，「史學層次理論」實在也是卑之無甚高論，前人亦不乏論述和實踐，作者的難能可貴處在於自覺地將三層加以貫通並付諸實踐，同時在基層史學研究中，把傳統的例證法發展為統計例證法。雖說目前的成果只限於前二層，但我們有理由對他將來的研究抱有一定的信心。

本書還有兩個特點值得表彰，一是作者花費巨大心血，用竭澤而漁的辦法網羅史料，並借助現代化手段進行考證、分類、統計，最後製成詳盡準確的圖表。這項工作將為他人在這個領域的研究提供極大的方便。二是作者在研究中嚴守學術規範，表現出認真誠實的良好學風。全書幾乎無一語無來處，參考文獻有詳盡準確的著錄，關鍵詞語有準確的索引，引述他人的觀點一一交代出處並加以簡要的評述。最值得稱道的是，作者自己的觀點若得自他人的啟發，必予以說明，決不掠人之美，即使並不同意那個觀點，評述中仍流露出由衷的感激之情。在此學風浮躁、學術普遍腐敗、學界呼喚規範之時，這本書可說是一個難得的典範。

總之，軍功受益階層這個概念為「中華帝國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嶄新獨到的視角，並形成了一個宏大的構想，而自成一格的史學理論、精湛考究的實證方法，再加上誠實嚴謹的學風，使這個構想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